

■ 讲述



藤条江边

海拔约3166米的哀牢山,满布着稠密的原始森林。如果不是上世纪50年代末,人民解放军一支小分队去森林附近巡逻,发现了有人走过的痕迹而跟踪寻觅,是难以知晓森林深处还藏着几千名裹兽皮、吃野果兽肉,长期过着野人般生活的苦聪人。

军队和地方政府组成的工作组,几经曲折才找到苦聪人,并帮助他们迁移到原始森林外边定居。

1962年4月,我曾攀上哀牢山,去了解寻找苦聪人的过程。

我渡过红河去到金平,与曾经参加寻找苦聪人的武装部干部鄢国平会合后,就一起去往勐拉坝,准备从那里攀爬哀牢山。

勐拉坝是藤条河边一块较平坦的坝子,居住的全是傣族人。竹林、大青树、芒果树围绕着村寨,很是美丽、幽静。

这里原没有旅馆和招待所,只有几家供马帮歇宿的、茅草顶竹篾墙的马店。那年月,城乡物资缺乏,来往的马帮也少;马店的事管人抱着大竹筒坐在门口的大青树下“咕咕”地吸着水烟,神情很是落寞。

我们只好歇脚于区政府里。那是一座古老的傣式木楼,年代过于久远了,一有人走动就会发出不胜负荷的“吱嘎”响声。

在区政府我们遇见了年轻的哈尼族女干部普秀英。几年前她也参与了深入原始森林寻找苦聪人的工作。听说我们要去金竹寨,她说,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那里的苦聪人了,愿意和我们同行。

鄢国平也说:“她比我还熟悉苦聪人,苦聪话也说得更好。有她去更方便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上路了,还有一位翁当乡的女文书黄翠花与我们同行。这是个身材小巧、出生于勐拉坝的傣族女子,热情、能干,对沿途村寨也熟悉,边走边向我介绍这一带的人文地理,使我获益不少。

过了藤条河往山上走,中午的太阳正辣,我用一条湿毛巾搭在草帽上,走一段路就被晒干了,只好又到路边水沟里去浸湿。

这段时间,本来不适宜爬山远行,但是黄翠花、普秀英说:“如果不尽快上路,就难以在今晚赶到这次行程的第一站、位于半山腰的翁当寨。”

山越来越高,转身往下看,那本来宽阔银亮的藤条河变得又窄又细,似乎也在火热的太阳照射下缓缓地烤干了。

我们在养菜坪吃过晚饭,又继续在夜色迷茫中赶路。普秀英不主张停歇,她从风向和云彩中看出,今夜可能有暴雨,我们必须抢在大雨前赶到翁当寨,不然一下雨,山路就泥泞难行了。

不过夜间赶路却很凉爽,山风腾起,把白天的暑热都驱走了。

群山黑黝黝的,又常常需要穿林过涧,我是难辨南北,好在有普秀英她们引路,我只要跟着走就行了。

半夜,我们才摸到翁当寨。这是乡政府所在地。黑暗中,我只觉得这寨子似乎建在一堆大大小小石头之间,走几步就会碰撞到石头上。

我被领进一间漆黑的房间,用手电筒照射着找到了一张床铺,又去屋后边的溪水里洗了脸脚,就睡下了。半夜,果然下起了大雨,雷鸣电闪,粗重的雨点似乎要把这小木屋击穿震碎。

我很庆幸,听了普秀英的话,路上没有停留,如果半途遇雨,那才狼狈呢!

第二天早上,风停雨住了。我在寨子里转了转。这确实是座建在大石头之间的寨子,住的都是哈尼人。妇女们美丽、修长、和善,见到我们都很亲切有礼。

我们在这里停留了一天,走访了一些人家,获知了不少她们过去与苦聪人来往的事。

第三天一早,山野还被浓厚的白雾笼罩,我们就上路了。

山更陡,路也更窄小了,几乎都是在悬崖绝壁间绕行。普秀英为我削了一根手杖。我自感身体好,使用手杖太老气横秋了,推辞着不肯要。

她却用命令的语气说:“拿着。有用呢!”

等我走了一段路,才明白,如果没有这根手杖,我是爬不上那高悬于云端的金竹寨的!

我们爬过了一座山头又一座山头,累得直喘气,但是普秀英告诉我,离金竹寨还远呢!加紧走,也得走到夜间才能到达。

我们只好尽量少停留,除了在途中的新安寨吃了顿午饭外,也没有多休息。

可能是苦聪人很少下山来,也就没有人来修山路,我们走着走着却没有路了,只见悬崖间都是大树藤条。我还以为是撞进了原始森林呢!幸好普秀英、鄢国平记忆力好,能从几棵形状特异的大树、几块不同于一般的大岩石,辨认出该怎么往金竹寨方向走;遇见陡峭的悬崖,我们就手脚并用地上去攀爬……

傍晚时分,我们才爬上了金竹寨。

攀上哀牢山

——边地生活记事

□ 彭荆风



作者采访苦聪人

记录

二

金竹寨,这是多么美丽的名字,在我的想象中,一定是大片的金色竹林围绕着村寨,闪烁着金色的光辉。但是这周围却是一片光秃,连一棵小树都没有。刚从原始森林里出来的苦聪人,还不懂得保护居住的环境,把那些金竹当烧柴砍伐完了。

寨子里约有二三十户人家。壮年男女都进原始森林里去打猎、挖药材了,只留下了一些老人守家。

苦聪人的房屋都是棚屋样式,低矮、窄小。我们几个人,只能分住三家住下。我已经走得脚腿体软,似乎再挪动一步都难了,就找了个藤条编织的小矮凳坐在棚屋外歇息。

爬了一天山路,如今停下来,只觉得全身的血都在往上涌,脸颊如同火烫一般,尽管山间的凉风阵阵扑来,还是长久难以消退。我想,如果不是我身体还结实,一定会因此得脑溢血。

9时左右,天色才完全转入昏暗,飘浮在山脚下的白茫茫云雾也更浓厚了,如同一大片银白的大海,把山间的森林、峡谷全都掩埋到底下,只有几座过于高耸的山峰像孤岛般兀立在云海外边。

过了一会,只见云雾下边有团东西在晃动,并悄悄地向上拱……我还以为有条大鱼在翻腾,但是又不见鱼的头尾,也就更用心观察,只见那团东西经过一番挤压后,一只闪亮的巨大“银盘”露出了海面,滚动在银色的波涛上。

这是一轮满月。月亮却会出现在山脚的云海里,也表明这金竹寨所处的山岭够高耸了。

这只“银盘”在云海上风快地滚动了几下后,也不知是凭借强劲的山风,还是自身的弹力,陡地以一种炮弹出膛的急速速度跃起,转瞬就升到了寨子的上空,把它那难以计量的银光倾泻下来。山野顿时变得更加明亮、柔和了。我也被这月色浸泡得遍体柔软,脸上没有先前那样火辣辣痛了。

这天晚上,我住在李老二家。他夫妇俩带着小孩进老林去了,只留下一个老母亲守家。

小棚屋低矮、简陋,除了火塘上有口小铁锅,旁边摆着几只土碗外,别无他物。真是四壁萧条。

李老二的床是用几块大竹片组成,离地仅十来公分,床上什么都没有,御寒的毡子已经被他带进原始森林了。我把自己的被褥铺在他的矮床上,也没洗脸洗脚就睡下了。

走路很累,倒下就睡着了。但是一会儿就被许多虫子咬得全身奇痒难熬,我用手在脖子上一搓,再用手电筒来照着,竟搓死了7只跳蚤。我忙找出一盒清凉油来涂抹。这高山大岭上的跳蚤可能是第一次遇见这种药,全都闪开了。我才得以入睡。

下半夜两点后,突然几道惨白的闪电把山野照得雪亮,接着是一阵阵炸雷响声,随同狂风扫来的是粗大急骤的密集雨点……小棚屋的茅草屋顶,经过冬春的风吹日晒,都干得收缩了,也就难以抵挡这第一场大雨。雨水迅速灌入屋内,一会儿就遍地是几寸深的水,淹到了床沿。我像个“乘槎浮于海”的人,黑暗中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更担心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的水流会连人带棚屋冲下悬崖深谷。

我正无所适从时,睡在屋子那一头的普秀英却腾地

跳了起来。她不愧为久在山区生活的能干女子,抓过一把锄头冲往外边的大雨中,把棚屋前后的水沟挖开疏通,不让我水再往里涌,又把屋顶茅草摊开理平,雨水也就不再漏进来了。不过我的被褥、衣服全都淋湿了,火塘里也浸满了水,难以燃火来取暖,只好坐听那风雨的狂啸等待天明……

普秀英说:这是大山上雨季前的头阵雨,过几天还会天晴的。不过这场雨一下,那些进老林的苦聪人都会回来了。

三

第二天,去老林里的苦聪人都被昨天晚上那场大雨赶回来了。寨子里有了年轻男女,也就热闹起来了。

我住的这家男主人李老二,约二十六岁,干瘦、精悍,妻子娜娃却高大、美丽。见我们住在他家,很是高兴,连声说:“有远处的客人来了,真是太好了!”

我不能再占着他们的床铺,准备另找住处。李老二、娜娃却不肯放我走,把我的行李又搬回他们的床铺上。那天晚上,他们夫妇就在床铺前的潮湿泥地上铺了块兽皮睡下。这使我又感动又不安,但是又拗不过他们,不过我却许多天都睡不安稳。

这寨子里有个常驻的工作干部黄振中。他是藤条江边的傣族人,也参加过寻找苦聪人。在边地工作多年,对哀牢山、藤条江两岸的哈尼族人、瑶族人、傣族人、苦聪人的情况都很熟悉,给我讲了许多这些民族的过往历史和有趣故事,对我后来写作长篇小说《鹿衔草》很有帮助。

这5月初,时晴时雨,大雨天,我们就在火塘边与苦聪人聊天。苦聪人是拉祜族的支系。我1952年至1955年在澜沧和东盟的拉祜族地区做过民族工作,听得懂一些他们的话,再有黄振中、普秀英他们帮助翻译,也就更方便交流。

邻居家有个叫叶妹的七八岁女孩,很是聪明,也很好奇,我们聊天时,她经常凑过来听,听到有趣的事就会哈哈大笑。

有一天,我正在刮胡子,她站在后边看了很久,对我手里的小镜子很感稀奇,要我借给她玩玩,然后拿着小镜子风快地跑往外边去了。过了好久不见她送回来,我走到外边去找,才见全寨子的小女孩都聚集在一起,排成了一长列,逐个传递着那面小镜子来照看,有的还会伸伸舌头、抓抓自己的头发,看着小镜子里的自己大笑。

我才知道走出原始老林不久的苦聪人,还没有用过镜子。这个小叶妹后来也成了我的长篇小说《鹿衔草》中重要人物之一茶妹的原型。

天晴时,黄镇中、普秀英就带着我们进原始老林去寻觅苦聪人从前生活过的地方。寨子离老林不远,往上走两个小时就可以进入。

这滇南边地的初夏,穿件单衣都很热,老林里却是寒气沁骨,我穿上带来的棉衣还觉得冷。想到那些只有粗糙的兽皮可披、近于半裸的苦聪人,就那样熬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真是够艰难的。

原始森林里的空气并不清新,腐烂的落叶和鸟兽粪便混杂在一起,散发出如同沼气般的气息,呛得人头晕。

我问普秀英:“老林里空气这样恶劣,苦聪人从前怎么能长久生活下去?”

她说:“苦聪人也是从山沟里树林较稀疏的地方走,还会砍开一片林中空地建立村寨。他们也有通往外边的森林小道,不过这些年没有人走动,又被新长起来的树木、藤条、乱草封死了。”

那天,我们还再往里走,突然树林深处传来一阵狂野的吼声,虽然被密集的树枝叶阻隔,还是很令人心战。我惊恐地问普秀英:“这是什么声音?”

她也被吓住了,说:“不是老虎也是豹子!”

黄振中说:“像是老虎!”

我们5个人只带有一支手枪、一支猎枪,若是撞上老虎、豹子这些凶猛的大野兽还是很危险的,就急匆匆往外走。

这样在金竹寨生活了近一个月,雨水越来越大了,几乎是如同天河开了闸门似的日夜倾泻。黄镇中说:“得赶紧下山了。再下几天大雨,山里的小溪都会变成浊浪翻滚的大河,既不能涉渡也没有舟船可渡,那只能困处于大山上。”

我们只好匆匆告别金竹寨的苦聪人往山下走。

李老二冒着大雨、难舍难分地把我们送到了山下的新安寨。分别时,这个平日都是笑眯眯的汉子却哭了,我也掉了眼泪。

在泥水里连滑带跌地走了三天,才下到藤条江边的勐拉坝。在大山顶上住久了,又来到这平坝子上,却觉得这勐拉坝比过去宽阔多了。

许多天没有洗澡了,我放下行李就往藤条江边跑。跳进水里,脱下短裤一看,又淹死了几个从山上带下来的跳蚤。

几天后,我们又沿藤条江南去,在驻金水河的边防连队生活了一段时间,并在这连队里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鹿衔草》。

这样在生活当中酝酿、构思并写作的习惯,也是我从青年时代养成的,不过这要体力较好,才能适应边地的艰苦生活。

我把书名定为《鹿衔草》,是因为有一次李老二和我谈了许多在老林里抗拒伤病的苦事。他们没有医生,只有祭祀鬼神的毕摩,但是人人都会找草药。他们特别称道一种能够消炎止血的“鹿衔草”,被野兽咬伤后,找来这种草药口服、外敷,多数能转危为安。

他也叹息,草药虽然好,却无法改变他们的苦难,幸好解放军把他们找到并带出了原始森林……

这就启发了我用“鹿衔草”作书名。

■ 人物

到惠州时,天色已晚。一团黑云压在头顶,看样子雨不会小。刚住进宾馆,雨就“哗哗”下来了。宾馆的客房坐落在小小的江心岛上,四周全是水,靠一座小桥连接着对岸。雨越下越大,窗外模糊一片。

打开电视机,正好播放我国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将举行盛大阅兵式的新闻,其中有安排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方阵的内容。我一下子想到了一个惠州人,那就是叶挺将军。他是新四军的首任军长,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要的缔造者,更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少年时代崇敬的英雄非常多,而革命志士先烈在心目中分量最重。有一度,我废寝忘食地读北伐革命战争的历史,其间叶挺将军的英雄经历最让我激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甚至偏执地认为,叶挺将军是北伐军中最棒的战将,功劳最大。如果有同学敢说有哪个人超过叶挺将军,我就会找那个同学打架,逼人家和我产生共识。当然,有很多时候,我的说法很让同学信服,因为事实很清楚:叶挺将军指挥的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战斗中打出了大名声,成了北伐军的“铁军”。谁打得过这支“铁军”?

“铁军”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却没有改变北伐战争失败的命运。为了挽救革命,叶挺和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共产党人一起发动并领导了南昌起义。“铁军”正是起义部队的主力,承担了最重要的任务,牺牲也最大。起义很快失败了,但战斗和牺牲换来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回报——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人民的军队就在艰难的岁月里被英雄们缔造出来了。这支军队我们开始叫中国工农红军,后来叫八路军、新四军,现在叫中国人民解放军。“铁军”在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不断被补充、改编、调整,每次变动,都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铁军”精神不断得到新的弘扬,并凝聚在我们军队的军旗上,直到今天。

南方的雨,说下就下,说停就停。雨后沿湖边潮湿的石子路漫步,心情格外松快。头顶上的树枝不时滴下水珠,落到脖子上,清凉清凉的。虽是入夜,却能感觉天有些放晴,能看到一些星星。对岸是城市的街道,灯火明亮,马路上车来车往,商店里人进人出。一个惬意休闲的夜晚。

惠州真的是个好地方。经济发达,生态和谐,人民安居乐业,是一座特别适合居住的小城。然而,在上世纪初,这片土地却曾经到处是战火、鲜血、恐怖、死亡。由于地处重要的战略位置,惠州地区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一定要牢牢控制这个鱼米之乡。于是,革命与反革命在这里反复争夺,来回绞杀。惠州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也为此奉献了无数英雄儿女。叶挺将军就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代表。他经历了这块土地上的血与火,生与死。他从这块土地上杀出去,杀到了革命的最前列,杀到了抗日的最前线。也许可以说,他是从这块土地上杀出血路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早一批践行者、献身者之一。

英雄也是人。在后来读过的历史资料中,我注意到,叶挺将军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曾流亡海外。有研究观点认为之所以做这种选择,是因为叶挺将军被反动派通缉,在国内无处藏身。同时,他的思想出现了一些困惑和迷惘,情绪也有一些悲观,不得不远走他乡。我不是叶挺研究专家,无法更深刻地把握将军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但从人性角度看,处于如此严酷的现实斗争漩涡中,人容易在心理上产生渺小感、无力感、危机感而造成思想矛盾冲突。作为英雄的叶挺将军,也会经受人性的折磨与考验。但杰出的人物一定能够以一种强大的精神战胜人性的弱点,在民族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叶挺将军就是这样的人。叶挺将军之所以是英雄,就在于他的性格中储存着战胜人性弱点、化解精神危机、走出思想困境的强大道德能量。这种能量来源于他对民族的爱、对祖国的忠诚以及他伟大的英雄的品格。我们知道,在我们民族危亡的时刻,他身上强大的能量就迸发出来了。他从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很快回到祖国,挑起指挥新四军的重担。

新四军组建的早期实力并不强,甚至可以说,是一支弱旅。要在江南广大地区和侵华日军作战,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叶挺将军硬是率领这支部队狠狠打击了日军,粉碎了敌人的合围。新四军也因此发动群众,建立起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很快成了一支坚强的抗日“铁军”。

叶挺将军可以在战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却防不住抗日阵营里的阴谋和暗算。为了不让共产党的势力壮大,蒋介石调动大军,在新四军背后狠狠插了一刀,发出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重大。光一个军部,就有近万名指战员或惨遭屠杀,或受伤被俘。叶挺将军也被无理囚禁,关押在狱中达两年之久。此时的叶挺将军,已经是意志无比坚定的革命者。任何威逼,任何利诱,都无法动摇他心中的理想,都无法让他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诗作《囚歌》,就是他坚强意志和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蒋介石无计可施,只好放人。叶挺将军当即发电报给毛主席,真诚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把他以后的人生贡献给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在前往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叶挺将军不幸罹难。中华民族痛失一个英雄好汉。

关于这个事件真相的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国民党特务策划的暗杀行为。在那个冲突动荡的时代,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有一点是肯定的,像叶挺将军这样顶天立地、无私无畏的英雄,敌人一定恨之人骨,一定要加害于他的。

伫立湖边,对面街上的灯还亮着,但车辆和行人已经不多。喧闹的城市到了安静下来的时辰。湖面凉风吹来,思绪也随风飞扬开去。惠州人到底还是厚道,经济社会发展了,日子过好了,富裕了,仍不忘先烈英雄。这些年,整理了叶挺将军的故居,又专门建了叶挺将军的纪念馆,让惠州人的记忆里,永远有叶挺将军的非碑,永远在英雄的精神里获得生活和创造的力量。

说实话,往深里思考,我心里是有一股悲凉感的。在很多地方,革命文化已经淡出了人们的生活,革命英雄也随之淡出人们的内心。人们讲文化,更多地是把玩那些优雅、休闲、禅意的文化。人们讲英雄,更多地是崇拜娱乐英雄、时尚英雄、财富英雄。虽说不必过多指责当代文化的这种倾向,但总觉得我们好像正在失去精神中很宝贵的东西。

那些在我们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命运斗争中积累形成的文化,也许伴着战争、鲜血、死亡和毁灭,不那么温柔,不那么诗意,但怎么也不能被淡忘,哪怕是在最容易淡忘的年代。我们过着和平安宁的日子,可以感觉不到这种文化的存在,但不能以为可以放弃。实际上,这种文化已经变为一种精神财富,变为我们民族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而集中凝聚这种正能量的,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如果英雄在我们心中坍塌了,失去敬畏感了,我们民族前进的动力和能量就枯竭了,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从现实的状况看,我们民族精神的危机与风险是存在的。

作为一个惠州人,叶挺将军的精神在惠州能够得到保护传承弘扬,也算一种文化的幸运。

雨又下了。回到房间,电视里还在滚动播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新闻。不久之后,中国军队的方阵将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也向全世界宣示国家武装力量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何等威武,何等壮观。新四军的方阵也走在当中。叶挺将军的英魂与他们的光荣、与他们的梦想同在。

有一个惠州人

□ 张陵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